

侯开嘉 著

书法史求真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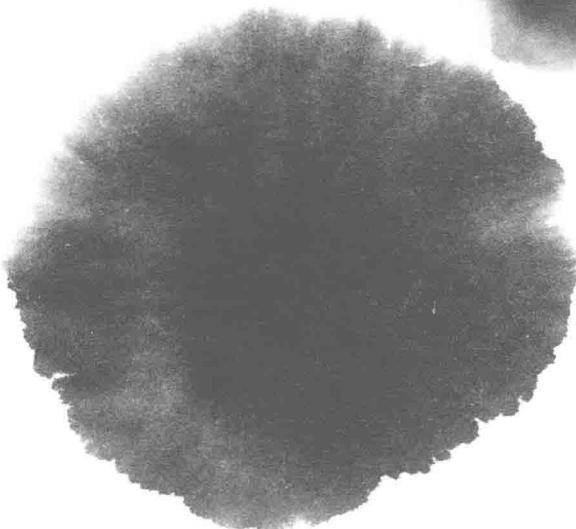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侯开嘉 著

书法史求真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法史求真录 / 侯开嘉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25-8537-3

I.①书… II.①侯… III.①汉字—书法史—研究—  
中国 IV.①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1325 号

## 书法史求真录

侯开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5325-8537-3

J · 582 定价：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自序

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  
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

——杨万里《庚子正月五日晚过大皋渡》

我喜欢杨万里这首诗，他居然把生活经历的一瞬间写得那么美，那么富有哲理，让人浮想联翩，耐人寻味。有时，我仿佛亦像这位早起的旅人，来到晨雾茫茫的江边，听到对岸村落隐约传来的鸡鸣犬吠之声，然后小心地踏上渡船，在雪白的霜板上清晰地印上第一个鞋痕……这条路上依稀再现了我的书法研究之历程。

我17岁开始学习书法，33岁开始写书法研究的文章。文章写起来顺风顺水，写一篇就发表一篇，很少有报废的，一写就写到70岁。但此时回首一看，发现写出的文章并不多，仅二十多篇而已，原因是写得太慢了。

我从不为评职称写文章，也没有申报过什么课题，写文章纯粹是喜欢而有浓浓的兴趣。几千年的书法艺术发展史扑朔迷离，里面留下了许多谜，一旦猜中其中一点，其欣喜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我愿意追随先辈们探索的足迹。梁启超说学问之价值是“善疑、求真、创获”；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在治学的途中不断探索，也是在不断地破解历史谜团。因而他们治学的方法也就成了我研究的方法了。

我写文章慢的主要原因是思索太多，在林林总总的文明碎片前，得花时间、花精力，用一根一根的线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串联起来，方

能看出一个大概的历史轮廓。你说,这样做快得起来吗?古人做学问称之为呕心沥血,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追求冥思苦想后豁然开朗的喜悦。老友陈振濂评论我说:“其理论研究之特征,是每发必有新见。”这句话听起来很受用。试想岁月如金,谁愿意浪费时间去“炒陈饭”啊!那不是在做自戕的傻事吗?

我的书专业性较强,非一般性的普及读物。所以,有的人读起来味如嚼蜡,有的人读起来兴趣盎然。因文章中大多涉及学术的前沿,所以是对读者有选择的。本书的读者主要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高端人群,其中有部分是史学研究者和少数书法家。甚至我想,我的书是留给后人看的,当今的评论并不很重要,而后世的批评才是关键。毕竟,时间是最公正、最严厉的审判官。

白驹过隙,岁月如水,转瞬之间便步入老年了。虽然常存李白那样的痴想:“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把时间留住。但想归想,现实归现实,身体已明显大不如前。特别是老眼昏花,阅读困难,看来是要终结我的学术研究之路了。但脑子目前还灵活,我以为现在是我学术思想最成熟的时期。因此,给学生上上课,辅导学生从事研究,还是蛮可以的。

此书应是我的收山之作。感兴趣的朋友,还可以找来《中国书法史新论(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一起翻翻,就能了解我研究的全貌了。东西不多,有点寒碜,但却是我一生心血所凝。

2017年元月17日于海南三亚

# 目 录

---

自序	1
西域文明的东播与颜真卿的书法创新	1
元代书法生态新论——从颜体书法在元代的际遇谈起	30
以学术激活艺术——乾嘉学派与清代碑学	59
邓石如的启示	86
张之洞与清代碑学的传播	100
吴昌硕与翁同龢交往事迹考辩	111
齐白石与吴昌硕恩怨史迹考辨	126
《流沙坠简》对二十世纪前期书法的影响	150
章草复兴百年之巡礼	169
关于王蘧常章草书史定位的断想	182
碑学视野下篆刻观念的转变	194
独辟鸿蒙篆学篇——对吴昌硕创大写意印风的追索	213
【附录】	
释门护法 书家圭臬——《圣教序》成碑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唐代书法的重大影响 / 程慧颖	232
论誊录制度对北宋书法的影响 / 宋二崇	251
科举与书法的再审视 / 薛帅杰	261
试论书法史视野下的宽容与严厉 / 钱超	275
论颜体楷书与宋体字的文化渊源 / 侯东菊	283
后记	293

# 西域文明的东播与颜真卿的书法创新<sup>①</sup>

## 弁　　言

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发展与繁荣的过程无不与汲取外来文明有关。其中全方位、大规模的汲取外来文明有两个时期：一是在唐代；一是在近现代。关于西方文明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举首触目大凡皆是，毋庸多说。而西域文明对唐代的影响，事隔一千多年了，人们对此大都模糊不清，印象淡薄。但在史上，由于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充足的自信，对外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促使外域文化在中国大量流行与发展，唐朝便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在此情况下，各个方面的杰出人物辈出，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唐文化。以今视昔，唐文化不仅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同时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鉴于此，这段令人向往的中外交流史，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逐渐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关注，并著书立说，如美国学者劳费尔(B. Laufer)的《中国伊朗编》、薛爱华(E.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以及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的有关论著。中国学者向达1933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的长篇专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是研究唐代中外交流史的力作。现在，当我们把学术的目光注视到这段辉煌历史的坐标上，去借助以上这些中外前辈们的学术成果，

① 本文的第二作者为刘志超。

继续深入研究唐代文化时，无疑会带来新的启示和新的发现。甚至一些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人和事，细究起来，也有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本文所研究的西域文明的东播与颜真卿书法的创新即为一例。

## 一、西域文明的东播促使唐代社会审美观的转变

公元 627 年，唐太宗登上皇帝位。这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为了巩固国家统一不久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措施。他常以亡隋为戒，注意休养生息；继续大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实施纳谏制度和发展科举制度，选贤任能，选拔了一批优秀的统治人才。在贞观年间，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为强盛的唐帝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因而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在对外关系上，唐太宗采用了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战胜了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使中西交通畅达无阻。据史载，到了盛唐之际，有一百多个国家与唐朝交往。这种交往带来的不仅是外国使团和商人的汇集，同时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日用品、艺术、宗教等。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涉及到唐代的舶来品就有：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等，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这些舶来品的进入，与唐代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因为那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有一种追慕各种各样外来奢侈品、奇珍异宝、服饰、舞乐等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最初由宫廷开始，逐渐传播到民间，从而广泛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这些外来物，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渐渐地改变了唐朝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艺术审美倾向的改变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以下仅从文艺的角度去审视初唐到盛、中唐社会审美观的转变过程。

初唐，有着北方鲜卑血统的唐太宗，为了维护国家刚统一的局面，安抚笼络南方世族，就大力推崇南方文化。他亲自主持重修《晋书》，在其自撰的《陆机传论》和《王羲之传论》中，称赞陆机华丽的骈文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王羲之秀雅流丽的书法为“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把二人推到了文艺的顶峰，成为初唐士人学习的样板。唐太宗提倡这种清绮秀丽的文艺风气，客观地讲，是与他宏伟的胸襟和豪放果敢的性格不相吻合的。但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个历史上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提倡这种文化对稳定刚统一的政权有利，特别是与经历了隋炀帝的暴政和多年战乱，非常渴望得到安定生活的平民百姓的愿望相符。因此，这种秀雅的审美倾向能在初唐社会风靡一时。当唐朝发展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丰足之后，社会的审美倾向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着雄强的审美观转换了，其中最有力的催化剂便是大量西域文明的进入。

魏晋战乱使咸、洛成为废墟。礼崩乐坏，中国音乐大量散失，因而亟须外域音乐的传入补充。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平高昌，得其乐部，遂将隋的九部乐益为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十部。十部乐中，燕乐为唐乐，清商为汉魏南朝旧乐，其余八部均由外国传入。武则天执政时，又将清商乐停奏。唐《通典》称：“自长安（701）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转缺。”这古曲，即指清商乐而言。由此可知，胡乐到盛中唐时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初唐流行的浮艳的南朝雅乐此时已经被社会冷落了。

到开元、天宝时，唐玄宗非常喜好音乐，他本身就是一位高水平的音乐家。到了晚年，他甚至荒废政事而纵情声色，以至于酿成“安史之乱”。他在宫廷里养了三万名乐工，供他享乐。此际西域诸国屡献胡旋女，胡旋舞遂传入中国，而唐玄宗深好之。据说杨贵妃和安禄山都能作胡旋舞，借以取悦皇帝。故白居易有“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sup>[1]</sup>的诗句。玄宗

还是一位演奏羯鼓的大行家，这种西域的乐器，被唐玄宗敲击得出神入化。在唐人南卓撰的《羯鼓录》中，就生动地记述了唐玄宗“羯鼓催花”的故事。开元中，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投其所好，献上西凉的《婆罗门曲》。此曲经过唐玄宗润色并制作歌词，易以美名，便成了中国音乐史上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帝王的喜爱，很快也为贵族士大夫所喜尚，西域的乐舞如“柘枝”、“剑器”、“胡旋”、“胡腾”、“凉州”、“回波乐”、“甘州”等便迅速地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以至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等地胡化极盛。元稹《法曲》云：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sup>[2]</sup>

王建《凉州行》云：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sup>[3]</sup>

音乐和舞蹈是最能影响人心的艺术形式。西域舞蹈中有“健舞”和“软舞”两大类。比较来看，当时最流行的，最能打动人心而引起共鸣的当是健舞。“胡旋”、“柘枝”、“胡腾”、“剑器”这几首乐舞，因在唐朝诗人的笔下多有提及，被反复吟诵而闻名于世。这表明，西域乐舞那种雄健刚毅、热烈奔放的风格，已成为盛、中唐社会对文艺审美的主要取向。

绘画方面，唐以前就有不少西域画家流寓中土，《历代名画记》中就记有曹仲达、僧吉底俱、僧摩罗菩提、僧伽佛陀、僧昙摩拙叉等人。在初唐，最有名的西域父子画家于阗国的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人称大、小尉迟。而小尉迟在唐人朱景玄撰的《唐代名画录》中被列为“神品下”，与阎立本兄弟、李思训、韩幹等并列，说明他的绘画极为时

人看重。而他从西域带来的凹凸画法,后人又称晕染法,对唐代不少画家都有影响,如在阎立本、吴道子的绘画中就熟练地运用了晕染法。<sup>[4]</sup>

对唐代造型艺术影响更大的是社会审美倾向的转变,特别是人物画、宗教画和雕塑。纵观唐代人物的造型,明显地感受到,初唐的人物造型清瘦,还带有所谓“秀骨清像”的意味,到了盛、中唐,人物形象大多转变为“丰肥腻体”的造型了。如张萱和周昉笔下所画的贵族妇女,都是体态健硕丰满、风度雍容华贵的美人形象。盛、中唐壁画和雕塑中的菩萨造型也是丰满圆润、凝重优美。唐代流行“宫娃如菩萨”的话语,实际上应是菩萨如宫娃。因为那时艺术中的造型,无不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来塑造的。而盛唐现实生活中的美人标准,已经从瘦削型转变为丰腴型了,唐玄宗的宠妃,著名的美女杨玉环便是典型的一例。

由清瘦为美到丰肥为美的转换,是唐代普遍的社会倾向,书法艺术也不例外。唐太宗提倡王羲之书法,在其影响下,从宫廷到社会,都摹仿王书。初唐欧、虞、褚、薛四大家,其书法风格均有王书那种瘦劲姿媚的时代风尚。到了盛唐,书法就像时人欣赏美女那样由瘦变肥。唐玄宗的字,无论是隶书《石台孝经》,还是行书《鹡鸰颂》,都写得肥厚。张旭的字也肥,徐浩、苏灵芝的字也肥,颜真卿身处时代风尚之中,他写的字当然也肥。不过他的字是雄壮而宏伟,不像唐玄宗、苏灵芝的字是肥而俗浊。

盛唐除了崇尚肥硕为美之外,还十分崇尚自由豪放,那时最受社会追捧的书家当是张旭,最受人崇拜而惊叹的书法当然是张旭的狂草。李白诗云:“楚人每道张旭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回顾,四海雄侠两追随。”<sup>[5]</sup>杜甫诗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sup>[6]</sup>在唐文宗时,皇帝下诏,以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为三绝,由此可知,张旭的狂草已被推到了时代的顶峰。张旭的狂草艺术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多得于外界事物的启迪

而顿悟。其启迪之一，便是西域乐舞。杜甫在诗序中说：“往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sup>[7]</sup>剑器浑脱舞，是西域流传入中国有名的健舞，杜甫在诗中形容其舞姿状况：

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sup>[8]</sup>

公孙大娘这种豪荡激烈、大开大阖、动人心弦的舞姿启发了张旭，他把这种西域舞蹈的表现形式运用到狂草中去，因而草书大长。同时人释皎然在其《张伯英草书歌》中描述道：

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欲飞堕。  
更睹邓林花落朝，狂风乱搅何飘飘。  
有时凝然笔空握，情在寥天独飞鹤。  
有时取势气更高，忆得春江千里涛。<sup>[9]</sup>

张旭这种低昂迥翔之状的狂草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的艺术表现何其相似。故徐渭认为公孙氏的舞姿就是草书，张旭的草书就是舞姿，而引发出“野鸡啄麦翟与翬，一姓两名无雄雌”<sup>[10]</sup>的感叹！

张旭还私下对弟子邬彤说：“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sup>[11]</sup>所谓“惊沙坐飞”，即指大漠中的沙尘暴。把平地忽起、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与空气中自振的小草相联系，能将如此反差极大的对比关系寄寓于草书之中，所以得到了韩愈的称赞：“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sup>[12]</sup>这种大胆夸张的艺术形式，与公孙大娘舞剑器所表现出的“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神奇舞姿，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种强烈的艺术夸张手法，直接启迪了后来颜真卿的书法创新。

## 二、新兴高型坐具与书法新笔法的产生

西域文明的东传,除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中国产生影响而外,对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而与书法直接关联的是坐具的改变,它影响了书写时的坐姿,从而使书法在原有笔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变革。

在唐代以前,人们的起居习惯主要是席地而坐,与之相应的主要家具是几、案、茵席。自西北民族和佛教僧侣把胡床这种坐具带到中原之后,垂足而坐的姿态就在中原人士中出现了。

何谓胡床?《词源》称:“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也叫交椅、交床。由胡地传入,故名。”胡床大约是东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床的产生,大概是西北游牧民族由于经常迁徙的缘故,而制造出这种轻便、舒适、能折叠的坐具。当胡床传到中原地区以后,渐渐地被中原人民所喜爱而接受。

古人席地而坐书写文字的姿态,我们从1958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青釉双坐书写瓷俑(图一)就能明白地知晓。此件西晋永宁二年(302)的瓷俑,清楚地表明了当时文人席地而坐书写时的一种常态。胡床传入后,坐姿由席地而坐变为垂足而坐,此际文人又是怎样的书写姿态呢?从北齐(550—577)宫廷画师杨子华受命而作的《北齐校书图》(图二)可见一斑,图中右边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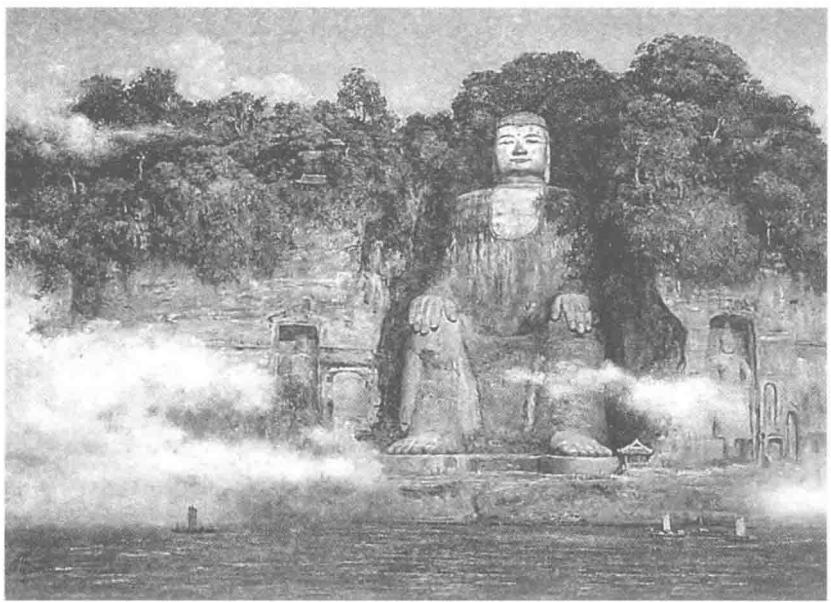
图一 西晋青釉双坐书写瓷俑



图二 北齐校书图

坐胡床垂足着地,右手持笔书写,而他的左手托住纸的下方,前面由侍者捧住纸的上方。这大概便是垂足而坐的书写状态吧。从此图中反映出胡床已经进入中原贵族的居室,成为常用的坐具之一。另外,写字时须有另一人协助捧纸。若无人时,恐怕必须有与坐具相适应的高案桌才行。这里表明,可能会有与垂足而坐的胡床相配套的家具产生。这是一种发展趋势。

胡床的传入改变了中原人士席地而坐的习惯,影响了中原坐具向着高型化的方向演变。进入胡风炽盛的唐朝,这种演变的速度尤其迅速。初唐时,席地而坐和垂足而坐的两种姿态还同时存在,而到了盛、中唐时,垂足而坐就成为人们主要的坐姿了。现在四川乐山市的凌云山前,还能看到一座就山临江开凿的弥勒佛像,像高71米,气魄雄伟,为我国最大的佛像(图三)。此大佛为海通和尚在开元元年(713)到贞元十九年(803)间所造,其造型最大的特征是垂足而坐。而此之前的佛像造型是或站立或盘足或侧卧。佛教艺术大



图三 乐山大佛



图四 周昉《宫乐图》

都是现实中人间世态的反映，坐姿的乐山大佛便可印证盛、中唐时垂足而坐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态。

在胡床垂足而坐的影响下，高型化的椅和凳出现了，而且还出现了与之配套的桌子和大型条案。这种高型化的椅、凳、桌、案，最先出现在宫廷（图四），又逐渐到贵族家庭（图五），以至于最后普及到民间的百姓之家。案和椅的重要功用之一便是可以在上面写字。虽然历史资料极度匮乏，未能找到直接的图像，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五代周文矩绘的《文苑图》中见其端倪（图六）。此图中用以书写的高石墩，起到了高桌案的作用。

沙孟海先生曾发表过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古代书法执笔初探》。他认为“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能尽同，主要是随坐具不同而移变”<sup>[13]</sup>，提出晋代习俗是“席地而坐”，王羲之等人写字是斜执笔的观点。笔者一直是沙先生此观点的支持者，因此本文在沙先生观点的



图五 韩熙载夜宴图

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席地而坐的习俗的改变,进而再考察盛、中唐时垂足而坐习俗形成后,在高桌案上写字对书法笔法产生了什么影响和变化。

唐贞观年间的书法家韩方明,自谓书法得到徐疋和崔邈的传授,因而写了篇《授笔要说》的文章。而徐疋笔法得自父亲徐浩的传授,崔邈得自张旭。徐浩、张旭都是盛唐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而《授笔要说》的内容应出自盛唐。文中介绍了当时有执管、簇管、撮管、握管、搦管五种执笔法。他最推崇第一种执笔法执管。(其余四种执笔法是题壁、书图幛和书大字的执笔法。)此笔法为:

夫书之妙在于执管,既以双指苞管,亦当五指共执,其要实指虚掌,钩攢许送,亦曰抵送,以备口传手授之说也。……曰平腕双苞,虚掌实指,妙无所加也。<sup>[14]</sup>

文中言及执笔要“平腕”、“五指共执”和“实指虚掌”,一看此即是正执笔法而不是斜执笔法。因为斜执笔法是不可能平腕的,对照“西晋青釉双坐书写瓷俑”的执笔姿势便十分明白。而这种正执笔法是只能在高椅高案上书写才可能出现的笔法。后来,晚唐的陆希声把它整理为“撮、押、钩、格、抵”五字执笔法。这种执笔法一直流传至今,因为我们现在仍是垂足而坐在高椅高案上书写。

在高坐具上书写,除了出现新的正执笔而外,还出现了不少新的



图六 周文矩《文苑图》(局部)